

# 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的策略与现实意义

郭舒然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以如何正确认识网络媒介、如何合理选择和接触网络、如何正确理解和鉴别网络信息、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媒介素养成为一个亟需讨论的问题。文章就网络媒介素养对既有媒介素养的拓展、其主要内容以及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媒介素养;网络传播;媒介批判能力

**作者简介:**郭舒然,男,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3-0022-04

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它包括了三个主要的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sup>[1]</sup>近年来,媒介素养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实践推广,其重要性正逐步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的互联网高速发展,网络媒体地位日益凸显,人们对于网络的依赖进一步加深。2010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了《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宽带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三项指标仍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网民人数已达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网站数量约368万个,博客1.8亿,手机网络用户突破2亿。面对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人们的生存能力、生活方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能力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新的媒体创造新的信息,反过来又要求新的获取信息方式出现”。<sup>[2]</sup>在此背景下,以如何正确认识网络媒介、如何合理选择和接触网络、如何正确理解和鉴别网络信息、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媒介素养成为一个亟需讨论的问题。

## 一、网络传播对媒介素养理论的扩展

既有的媒介素养理论,有着自己相对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但Web2.0时代的网络社会对此提出了修正和挑战。

网络环境中的把关悖论与意见市场的失范倾向给媒介素养培育带来新的挑战。自从约翰·弥尔顿提出“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命题以来,从没有一种媒介像如今的互联网一样形成一个不受控制和束缚的意见市场。对网络信息、观点放弃把关,会使得目前的网络意见市场存在失范的危险:各种力量的冲撞与失去引导的观点使得网络成为一个充斥着传播噪音的表达场所,拥有话语权的无数传播主体以公正、客观等新闻传播准则为幌子而行其政治、商业目的。而加强把关除了威胁观点的自由表达、信息的畅通发布之外,也可能使把关者根据自己的意图通过显性或者隐性的方式进行议程设置,形成另外一种传播效果与失真。以上种种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把关门槛的降低,为虚假信息与片面观点的泛滥留下了可乘之机,并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一是虚假信息导致人们形成与事实不符的意见,二是某些信息发布者出于种种目的,在网上散布谣言,影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秩序。传播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指出:“媒介越小众化,就越能被用来传递具有颠覆性和选择性的信息。”<sup>[3]</sup>这类信息混淆视听,严重的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稳定。三是这些不真实的信息经由网络媒体传播后又

由传统媒体进行“二次传播”，从而使得这些不良信息的传播范围得以扩展，负面效果加剧。在此背景下，受众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信息空间时，很可能失去理性和独立判断能力而成为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这正是网络暴力越演越烈、网络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也是网络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关注的一大问题。

网络传播交互性与双向性的特点使得提高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合而为一的趋势。传播者与受众在网络条件下出现身份统一的情况。互联网媒体本身的把关性不强，技术壁垒的打破使得网络受众加速向传者的身份演化，传、受一体化成为更为普遍的网络应用趋向。在网络空间中，传受双方易位频繁，呈现全方位易位趋势，传受双方往往是双重身份的人，传统的传播主体则被消解和多元化了，网络传播者较之传统传播者是由真实走向虚拟，确定走向不确定，由单一走向多重，集中走向分散。<sup>[4]</sup>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网络条件下，提高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有相互统一的趋势。交互性使得受众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习惯、风俗、信仰来选择接收的信息，他们与媒介有了更多的互动，“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环境使得他们可以更为自由、便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网络时代所产生的新现象、新问题也是媒介素养内容、结构需要拓展和调整的原因。

网络传播去中心化与祛魅化的特征使媒介素养产生了新课题。借用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论旨，整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精神上的祛魅史<sup>[5]</sup>。媒体包括新兴媒体也是不断的祛魅化的对象。传统的三大媒介的信息传播，从本质上讲都是一对多、点对面的传播，“是一种播放型传播，是一种树立中心意识的传播”。<sup>[6]</sup>这种“中心——边缘”的传播结构模式在网络条件下得以终结。超时空、无障碍的互联网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网络信息环境与传统的信息环境相比，更为多元、开放，也更为复杂，更具有双刃剑的涵义，这种传播模式与信息环境的巨大改变也需要媒介素养的结构进行创新与修正。进入网络时代后，尽管去权威化是网络传播的一大特征，但是新的网络媒体的依赖症与网络媒体权力的滥用使得二次祛魅成为需要。这些问题伴随着新时期的网络环境所产生，自然也是传统媒介素养理论难以完全解释的新内容、新问题。

## 二、提高网络媒介素养的着力点

第一，对网络媒介及信息进行选择性阅读，提高信息筛选能力。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环境中，对于时效性的盲目追求导致新闻的快餐化，因缺乏精工细致而食之无味、流于肤浅；为了提高趣味性使得标题与内容分离，“标题党”横行使受众点击了标题连接后大呼上当；读图时代为了吸引眼球设置大量图片却淡化了文字内容。面对海量的新闻信息，以及上述种种阅读障碍，受众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选择性阅读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网络新闻在第一时间对于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因此只需要扫描式阅读，获取基本的客观信息，以追求较高的效率，如果对于事件的相关信息与评论感兴趣，则可利用超链接进行进一步了解。其次，提高信息甄别能力。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不是专业媒体，信息传播者很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对于真实、客观、公正、平衡、全面这些新闻价值要素不一定理解，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可能造成信息失真。在此情况下，增强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辨别能力，对于一些吸引眼球的“噱头”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素养高的受众甚至可以甄别出隐性失实的新闻。最后，与传统媒介结合，进行互补式阅读，防止思维的浅化。在一些传统媒体网站点击该媒体的电子版，由于把关的相对严格，这类信息在权威性和真实性方面更为可靠。同时关注一些商业网站对于主流媒体深度报道、评论的转载，即享受了网络的快捷方便，也能提高对于某新闻事件的理性认识。

第二，对网络媒介及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理性批判能力。对于网络媒介要有理性的认识，早在上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理论，在网络条件下，随着数字技术的提高，受众所接触到的由媒介刻意安排、渲染乃至“制作、打造”的“现实”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建构的，也是再现建构的现实。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康西丁指出的，美国人所感知的世界与媒体所描绘的一样充满暴力和恐怖。因此，面对网络时代的这些问题，应当对媒介素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结构

调整,尤其是提高理性批评能力:首先,提高分析、评价网络媒介及信息的能力。面对越来越逼真的影像,越来越生动的媒介语言,如果不提高分析文本、把握问题的能力,会陷入媒介引导的误区中,认为媒介反映的就是完全真实的社会现实。提高受众解读媒介文化的能力,增强批判性,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和无用的媒介行为和信息,进一步由浅入深,“解构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机制,了解为何会呈现这样的媒介面貌,从而相对更加真实地了解世界的原貌。”<sup>[7]</sup>其次,提高跨文化传播的素养。既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网络的普及,使得受众更为方便的接触到外来文化,包括美剧、日本动漫、国外媒体报道等信息。这些信息在网络以外的传统媒介较难获得。这类媒介产品及其背后的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入自然会影响受众的观念、习惯,因此通过学习外国文化的优秀内涵,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学习精华之处以丰富本国文化,自觉提高对网络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及传播内容的批判意识,也是建构受众的网络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最后,培养成熟、理性的公民意识,理性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来看待本国的现实问题。一方面,理性地参与、关注网络公共事件。通过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进了收容制度的改变;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意味着公民私权不受公权力的侵害;在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中信息公开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2009年多起网络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对于自身合法权益的关注与公权力对于边缘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成熟的公民意识,有利于抵制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负面信息、谣言,批判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扰乱人们思想的外来信息;有利于辨别一些利益集团引导下的混淆人们是非、转移矛盾焦点的报道、观点、态度;有利于避免“娱乐至死”的媒介感官刺激与快乐主义,拒绝大众文化的简单复制品对于独立精神的侵蚀。

第三,在使用网络媒介时注意道德修养,提高伦理与法律意识。康德认为:“如果没有道德观念的发展,对于有修养准备的人是崇高的东西,对于无教养的人却只是可怕的。”<sup>[8]</sup>网络媒介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地域与文化体系的壁垒被打破,在加速人类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更多的冲突,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可以透过网络隐藏于看似客观的新闻中进行潜移默化式的传播,媒体从业人员与受众抵制不良思维与价值观的侵蚀,对于一些带有不良目的与倾向的信息传播进行防范、规避。与此同时,由网络引起的纠纷、诉讼也逐渐增多,个人隐私的泄露对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商业机密的泄露对于经济实体造成损失,国家机密的泄露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因此,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亟需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网络传播的效果,避免公民或者集体利益的损失。

### 三、提高网络媒介素养的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之一:有助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促进社会和谐、公正。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sup>[9]</sup>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在其中生成公众舆论,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在当前条件下,网络空间可以尝试成为公民的公共领域,而网络热点事件则是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进行互动的具体活动形式。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当然不宜将其理论主张简单地、直接地移植到中国。但他的某些研究结论例如关于公共领域的见解有着一定的可供借鉴的价值。传统媒介在承担公共领域建设方面效用不彰,与此对应的是,网络时代“第四媒体”崛起并承担建构公共领域的重任。提高网络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公正、和谐。

现实意义之二:有助于受众厘清媒介幻象,重塑主体性。尼葛洛庞蒂指出:“虚拟实在能使人造事物像真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事物还要逼真。”<sup>[10]</sup>网络虚拟环境可以容纳人们大量的与现实生活相

似的行为，虚拟环境又具有真实生活所无法具备的诸多条件，如前所述，当这个媒介世界日渐渗透、涵盖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人们生活的不再是真实的客观环境，而是一个不断的被媒介“生产”、建构的现实，真实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事物、现象都可以在网络环境中找到类似的存在，法国作家左拉在《论小说》中自信地表示：“真实具有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听错。”然而在媒介为王的信息时代，真实的声音通过媒介可以更好的传播，却也难免为媒介本身及背后的政治、资本力量所渗透、改变，成为真实、虚拟难以分隔的混合物。在此背景下，受众在网络媒介的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丧失主体性绝非危言耸听。

网络媒介素养的培育首先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以感官刺激为导向的媒介文化容易诱使青少年网民在享乐与低俗中迷失自我，正常的多层次的人格结构被取代。其次，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网络时代自由消费的假象具有一定的蒙蔽性，伴随网络技术而来的消费盛宴容易造成消费主体的迷失。最后，增强独立思考与表达的能力，避免在信息的汪洋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享受网络的方便快捷与简单阅读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于思考能力、读写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重视个性化言论与思维方式。只有这样受众才能认识到真实世界与网络虚拟环境的差异，从而看到虚拟环境对于真实世界的改变，认清网络环境“超真实”效应的本质，理解媒介文化的本质及其问题，从而避免人格的异化、肤浅化与娱乐化。

现实意义之三：有助于网民理解和使用媒介信息，促进自身发展。根据前述定义，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媒介素养的题中之义。要达到这个目的，受众必须掌握必要的媒介解读技巧，梅洛维茨指出：“在一种媒介中对信息进行编码或解码所需的技能和学识，很大程度上觉得在这个社会中谁能使用该媒介发送信息以及谁能获取媒介所携带的信息。”<sup>[11]</sup>在网络条件下，不同背景的传播主体在事实的选择、报道角度的确定、材料的搭配、发布时机的把握上各有不同，所传递的深层意义也不相同。作为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网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信息，并为自己服务，正如詹姆斯·罗尔所说的：“人民创造性的改变他们从媒介及别处得到的信息，以便适合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sup>[12]</sup>工业时代做的是信息的加法，信息时代做的是信息的减法，海量、过载的信息中的一大部分是与受众当前的信息需求没有直接关联的，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应有明确意识，在媒介中寻找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

## 参考文献：

- [1] 段京肃，杜骏飞．媒介素养导论 [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19.
- [2] [美] 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 [M]．熊澄宇，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1.
- [3] [英] 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7.
- [4] 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 [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82-86.
- [5] 杨照生．失魅时代的超越之维 [J]．读书，2009（6）：89-96.
- [6]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4．
- [7] 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 [J]．现代传播，2004（4）：26-29.
- [8]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81.
- [9]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曹卫东，刘北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 [10] [美] 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 [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转引自段京肃，杜骏飞．媒介素养导论 [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123.
- [11] [美] 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8.
- [12] [美]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化的途径 [M]．董洪川，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75.